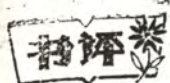


历史说明时代，时代造就人物

——读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

陈洪进



历史说明时代，时代造就人物

——读陈翰笙著《四个时代的我》

陈 洪 进

1988年秋末冬初，《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不久，我问陈翰老，这本书的英文书名该叫什么。他说，Throughout Four Political Periods。由此，我得到一个印象：四个时代指的不是他个人生平的四个时期，而是我国的历史时期。书里没有明确提到四个时代的划分。但通读全书，就可断定四个时代是指清朝（出生到14岁）、北洋军阀统治（14—30岁）、中华民国（30—52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52岁起）。这四个时期占本世纪的绝大部分。

按我国史学传统，传记大多是作为论述时代历史的手段，极少宣扬自己。在我国古代，编纂历史是王朝的事业，个人无权编写。“个人崇拜”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在我国，只有圣人才是崇拜的对象，但这是可望不可及的道德规范，而且任何人绝不能以圣贤自居。皇帝是尊敬的对象，不是信仰的对象。帝王神化了，反而成为无稽之谈的笑料。个人无地位的社会产生一种史学见解：真实地论述人物，也就真实地论述了社会。陈翰老的《四个时代的我》正是如此。他诚恳地陈述了自己，也就如实地描绘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读者从他的自传，可以了解他的生平，更重要的是从以往的历史汲取经验教训。

这篇短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翰老个性的历史因素来论证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翰老是我国一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对未来积极乐观的历史学家。他的个性与众不同。他力行忠恕，但反对儒家的封建专制。他欣赏美国早期的民主教育，但鄙视垄断资本的权势。他拥护苏联的十月革命，但从20年代起就拒绝教条八股的学风和沙皇式的专制作风。他赞扬西方文化，但对崇洋媚外却痛心疾首。

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世界现代史上新旧交替的时代：早期资本主义向中期资本主义过渡，英国的世界霸权向美国世界霸权转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解放。此外，他还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中国解放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翰老赴美留学的那一年，他才18岁，刚刚成年，距离童年还不很远。但他的思想并不幼稚。他在小学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中学受过辛亥革命浪潮的直接影响。他是带着爱国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离开祖国的。这不是因为他特别早熟，而是因为我国文化本身就是成熟的民族文化。这一点，他的出生地（太湖地区——无锡）表现得特别显著。

太湖地区是我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太湖在我国的价值超过地中海在欧洲的价值。地中海从14世纪起就围绕着相互征伐的国家和民族。太湖从9世纪起就围绕着经济上互赖互惠的同族居民。地中海海上贸易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起就被大西洋海上贸易所取代，沿岸城市相

继冷落。而太湖地区，作为公元9、10世纪的吴越国，经济非常发达，对外贸易直达日本、朝鲜、伊朗，到17世纪的清朝，太湖地区的五个府因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田赋岁收一向为全国之冠。

权势的支配力量在太湖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无锡的农田一般高于河网，河网高于湖海。无锡的农田面积容易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有的农田变为湖荡，有的湖荡变为农田。官方查定的数额历来晚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失去农田的农户往往被迫继续缴纳原定的赋额，而拥有大量农田的富户反而能逃脱田赋负担，这种不公平的现象，长期以来，习以为常。再加上水利工程和粮食漕运，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开支。中古以来，地方上权势人物把财政负担分洒在平民身上，再从公共开支窃取大量资金，据为己有，这样的弊病形成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权势制度，以土地为基础，以朝廷为依靠，以货币为渠道。因此，权势阶层与非权势阶层形成尖锐对立。权势阶层包括权势地主和官衙势力。非权势阶层包括平民、平民地主和工商经营者。非权势阶层对权势阶层的憎恨，对世态炎凉的厌恶成为非常普遍的风气。

太湖地区河网稠密，交通便利，无锡非但是我国一个经济中心，而且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无锡的东林书院不是官方主办的一所儒学，而是中古时期民间的一个学术团体。我国儒学到了公元11世纪发展到了理学阶段。北宋时，福建人杨时（杨龟山，1053—1135）来到河南，拜大程夫子程颢为师，随后又就学二程夫子程颐。大程夫子在杨时告别回南时，曾经说过：“从此，我的学说就在南方传播了”（“吾道南矣”）。这句话意味着：北宋的江山岌岌可危，儒学要靠杨时传到南方去了。后来，这位福建学者果然在无锡讲学18年之久。宋朝的龟山书院就是明朝东林书院的前身。二程儒学经朱熹（1130—1200）集大成，就成了著名的宋代理学。元朝（1271—1368），书院遗址变成佛教寺院。到了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无锡人顾宪成和高攀龙在龟山书院旧址修建了东林书院。东林书院曾经成为全国的儒学中心。有时，集聚的学者达1000人。东林讲学在国内首屈一指。明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政，书生抨击宦党，议论朝政。因此，书生在天津年间（1621—1627）遭到迫害，1625年全国书院被毁，东林书院首当其冲。书院在旧县城东部，门前有一片小树林，所以称东林。高攀龙在“过东林废院”诗里曾经愤慨地说道：“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意思是说，小小的东林书院，却有它深远的渊源，哲理和文学都非常深刻，即使把门前的树林统统砍掉，留下一片野草也还叫做“东林”。这显然是对权势阶层激越的抗议。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宦党受惩，1628年东林书院虽然恢复，但不及过去盛旺。

东林书院门前有一座石碑坊，石匾南面刻着“洛闽中枢”，“洛”指二程，“闽”指杨时；北面刻着“观海来游”，这是《孟子》里的“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一句话。讲堂名“依庸堂”，“庸”就是守恒持衡。“中和堂”里祭孔子，“中和”是《礼记》里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南祠”里祭杨时，这是大程夫子说的“吾道南矣”一句话。整个东林书院，无异一座孔子纪念馆或儒学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后来改为东林小学。到翰老在这里上小学的时候，这块“圣地”从宋朝龟山先生讲学算起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从明朝东林书院算起也有300多年的历史。这几百年

间，平民对权势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有的被文人写成传奇或剧本，如孔尚任（1648—1718）以复社为背景的《桃花扇》。有的成为传说在民间流传，就很难查考，而且越来越稀少。还有些历史被人民群众所消化，提炼成谚语、格言，成为人民的处世哲学。那就更加难于追踪了。

我国历史缺少民主思想，但有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它能促进平民的自尊心，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民本思想也有利于民主思想的成长。明末清初，平民反对权势的思潮在太湖地区盛行。平民阶层在反权势斗争中曾经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事业心、冒险精神和独立个性。这正是社会前进最可贵的动力。也正是这种动力，才使得无锡能够后来成为我国民族资本家最早的“发祥地”。

翰老7—11岁（1904—1908）在东林小学上学。11—17岁（1908—1915）在长沙读中学。东林小学是东林书院的遗址。长沙的民德中学是同盟会人办的学校。所以他从小带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出国留学是完全正常的。

翰老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斗争是对北洋军阀政府派往美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的示威活动。华盛顿会议距离我们的时代，并不很远，它是1921年召开的。同年，早5个月前，中国共产党成立。5年后，五卅运动爆发。6年后，北伐战争开始。当时，留美学生从外国报章杂志，了解到的军阀卖国和列强侵华阴谋，远比国内详细，所以留美学生反对代表团运动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因巴黎和会而引起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

“半殖民地”这个名词，我国人民大众对它并不陌生。但是，认真讲起来，我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是从1921年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在这以前，英、俄、法、德、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1899年英国公布英俄划分势力范围协定，就是瓜分中国的实行。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已经超过英国。但没有来得及插手侵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来反对列强垄断中国。华盛顿会议不仅是美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重要历史事件。中日甲午战争（1894）是鸦片战争（1840）后的一次重大转折。华盛顿会议上有关中国的问题都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和俄德法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还辽又引起了德军占领山东胶州湾（189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参战，接管了德国在山东侵占我国的领土和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华的强盗行为在巴黎和会上反而受到列强的承认。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到这时候，出现了奇迹。在此以前，中国对外关系从来都是卖国政府的外交官员应付一群帝国主义强权老谋深算的外交家，除此而外，没有第三种力量。可是，到了帝国主义强权企图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主权来满足日本侵华野心的时候，中国人民却兴起了反对军阀卖国和列强侵华的五四运动。运动震动了全世界，使得中国外交官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事隔一年，美国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召开华盛顿会议，在名义上是为世界和平裁减海军军备，实际上是拆散在华的英日同盟，为美国势力渗透中国创造条件。美国巧妙地逃避国际责任，安排中日代表在国际会议之外，另开秘密会议直接谈判，英美代表则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谈判，尽量保持英日在华利益，同时骗取中国的好感。当时，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列强的强权外交和秘密谈判。帝国主义的这一套阴谋使得年轻的陈翰笙大开眼界。严峻的现实使他终生鄙视垄断资本权势，痛恨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丑恶。因此，他

对崇洋媚外痛心疾首。

可是，他对美国早期的教育始终赞扬。他根据的是他亲身的感受。翰老从18岁（1915）到25岁（1922）是在美国受教育。当时，美国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期间：旧式教育没有完全绝迹，新式教育没有完全普及。所以，翰老当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两种教育。这两种教育最显著的差别是对待学生的态度。旧式学校的校长的工作作风是“婆婆妈妈”，熟悉每个学生的品质、性情、学业，并且关心他们的发展前途。新式教育只关心学生的知识，不计其他。美国教育跟中国教育完全不同。中国是国家办教育；美国是居民办教育。

总起来讲，美国教育有这么几个特点：

居民富有创业精神。美国早期居民就是欧洲移民。17世纪的移民大多是英国被圈地运动赶出来的农民。18世纪的移民主要是法国、德国、爱尔兰受迫害的新教徒。这些人都是些很能干的生产能手，受到旧势力的压迫，走投无路，冒险到美洲来兴家立业。

教育制度富有民主原则。美国的教育是居民一手创办起来的。1647年麻萨诸塞州规定：每乡满50户设小学一所，满100户设中学一所。民政基层单位叫做“校区”。校区有居民大会。筹办新校、维修校舍、筹集经费，概由校区居民大会决定。居民大会选举校区理事。校区理事负责管理学校，聘请教师。居民认为，做好校区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公民教育的实践。政府认为，教育是地方事业，政府只支持，不干预。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和《宪法》（1787）都没有提到教育。

教育经费有可靠保障。早期教育经费靠土地。《1785年土地条例》和《1887年俄亥俄州西北地区条例》规定：每乡分成36个地段，每一地段含640英亩，每乡有一地段的土地或出售，或出租，作为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另有立法规定：从1848年起各州每乡第16号地段和第36号地段的土地都作为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到1900年为止，划作教育经费的土地共达8616万英亩（合34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我国皖、浙、闽三省面积总和。此外，政府还给各农业学校及机械学校拨款。美国教育即是民办又有充足经费，所以教育很发达。

教育内容适应社会需要。美国社会认为义务教育是民主生活最根本的基础。美国社会要求小学教育培养学童正直、诚实、恭顺、守时、守规、守秩序的习惯。

翰老称赞美国早期教育，大概与上述四点有关。

上述儒家文化、美国教育和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固然与翰老个性有密切关系。但是，还需要解释为什么同翰老一起同受美国教育，同在一起参加政治斗争的青年，有的不久就分道扬镳，有的竟与反帝反封建背道而驰。

翰老对这个问题有切身体会。他对他母亲的教导终生难忘。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的性格和道德观念都是从母亲那儿来的。母亲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从这里，我们探索到翰老个性的源泉。我们不应低估他母亲谚语的教育作用。谚语是用格言的形式表达人民的智慧和生活经验。它使人们用格言来进行思维，来检验自己的行为。母亲通过谚语把传统文化传授给学前儿童，犹如母体通过脐带把养料输送给胎儿。胎儿一出世，脐带就剪断了。同样，成年人一般都忘却童年的儿歌、谚语、格言。但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对人民的思想却有高度的识别能力。翰老特别重视童年时期的谚语，原因正在于此。这里有一条宝贵经验值得重视：道德、文化、世界观是一个整体，总是相辅相成的。